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经典插图珍藏版

了解日本及日本人的最佳读本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秦海霞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经典插图珍藏版

了解日本及日本人的最佳读本



菊与刀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秦海霞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经典插图珍藏版

了解日本及日本人的最佳读本



菊与刀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作者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度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ISBN 978-7-5145-0000-4

9 787514 500004 >

定价：32.00元



菊与刀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秦海霞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菊与刀 / (美) 本尼迪克特 (Bvedict, R. F.) 著;
秦海霞译. —北京 :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45-0000-4

I. ①菊… II. ①本… ②秦… III. ①文化—研究—日本
②民族心理—研究—日本 IV. ①G131.32
②C95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2963号

菊与刀

著 者: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译 者: 秦海霞

责任编辑: 董拯民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11号西门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12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 1—12000册

开 本: 787×1092mm 1/16开

印 张: 17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45-0000-4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任务：日本	007
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021
第三章 各得其所	043
第四章 明治维新	071
第五章 承受历史和社会之恩的人	091
第六章 报恩于万一	103
第七章 最难承受的人情债	121
第八章 维护名誉	133
第九章 人类情感的世界	159
第十章 美德的两难处境	175
第十一章 自我训练	203
第十二章 孩子的教育	223
第十三章 投降后的日本人	257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第一章

任务：日本



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作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对手。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曾有过这么一个主要对手，由于它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我们完全迥异，以至于需要我们对它认真加以考虑。我们就像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在和一个全副武装并经过严格训练的民族作战，但它并不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员。被西方国家视为人类天性的战争惯例，很明显在日本人那里并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在太平洋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海岸登陆作战，也远比那些后勤上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更加严重。这些困难使得了解敌人天性成为一个主要难题，为了解决它，我们不得不去了解日本人的行为。

困难是巨大的。在75年前，自从日本紧闭的大门被打开后，对日本的描述总是出现在一系列最匪夷所思的作品中，那些作品总是运用“但又”这一固定句型，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过的。当一个严肃的观察家在描述日本之外的民族时，他可能会说，“他们是前所未有的礼貌民族”，他不太可能会再加一句“但是他们又傲慢专横”；当他描述一些民族在行为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顽固时，他不会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极端的革新”；当他描述一个民族性情驯服时，他通常不会解释说他们并不是那么容易驯服于上级的控制；当他说他们忠诚且有雅量时，他不会宣称“但是他们又背信弃义、满腹怨恨”；当他说他们天生神勇时，他不会详细叙述他们如何怯懦；当他说这一民族的人完全是按照别人的观点来行事时，他不会接下去说他们怀有一颗真诚得令人吃惊的良心；当他描述说他们的军人都被训练得像机器人时，他不会继续描述那些军队中的士兵如何不服管训，甚至犯上作乱；当他描述说一个民族将自己所有热情都奉献给学习西方时，他不会再详细描述该民族极端热忱的守旧性格；当一个人写了一本书来讲述一个普遍崇尚美感的民族，说他们极端尊敬演员、艺术家，以及丰富的菊花养殖艺术时，他通常不会被迫再写一本书来补充说，这个民族如何崇敬刀剑，以及武士如何具有无上威望。

但是，所有这些矛盾表现，却正是有关日本的论著中的经纬；而且这些都千真万确。刀与菊都是这幅画的组成部分。从最大程度上来说，日本人天生好斗，但又非常温和；穷兵黩武，但又珍视美感；孤介傲慢，但又彬彬有礼；顽固强硬，但又柔顺善变；驯服谦恭，但又不听摆布；非常忠诚，但又易于叛变；天生神勇，但又胆小怯懦；固执守旧，但又顺应潮流。他们极端重视别人怎么看待他们的行为；同时，在发觉别人没有发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为战胜自己的羞耻心而窃喜。他们的士兵被严格训练成武器，但是这些人又富有反抗精神。

当美国了解日本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矛盾表现和其他一些同样喧嚣的矛盾表现都弃之一旁。严重事态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下一步

日本人会怎么办？如果没有攻入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皇宫吗？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期望得到什么？在针对日本军队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怎么表达，才能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且削弱日本人那种战斗到最后一人的信念？这些问题在很多非常了解日本的人中间也都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当和平来临，是不是只有靠永久的军事管制才能保证他们遵守秩序？我们的战士是否要被迫在日本的每一个山口要塞与拼死决战的日本兵战斗到底？在世界和平成为现实之前，日本是否也得来一场革命，就像法国大革命或者俄罗斯革命？谁来领导这场革命？除了根除日本人，还有没有别的替代方式？这些问题也让美国人感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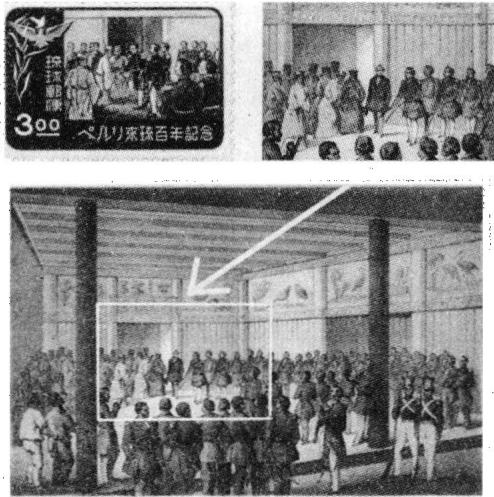
1944年6月，我被指派研究日本。我接手的任务是，要使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能，来拼出日本人到底像什么。那年夏初，我们针对日本的巨大攻势已经开始展现其真正的威力。美国人仍然在说对日本的战争将要维持3年的时间，也许10年，也许更长；而日本人则认为它会持续一个世纪。他们说尽管美国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土还有数千英里之遥，他们的官方公报几乎不承认他们在海上的失败。日本人仍然视自己为胜利者。

但是，6月时，形势发生了逆转。在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时间里一直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结束针对德国的战争已经指日可待。在太平洋上，我们的军队已经在塞班岛登陆^[1]，这一军事行动预示着日本彻底的失败。从此以后我们的战士离日本兵越来越近，就要与其短兵相接。从新几内亚、瓜达康纳尔岛、缅甸、阿图、塔拉瓦岛和比耶克岛的战役中，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已经给了可怕的敌人重重一击。

于是，在1944年6月，回答上述一系列关于日本的问题已经变得很迫切。这些问题当中，不管是军事的还是外交的，也不管它是出自最高决策的要求，还是被抛撒在日本前线的传单中所提出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给予深入解答已经很重要。在对日本的战斗中，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不仅仅是东京当权者们的目的和



1853年，马希·佩里准将被委托将美国总统米拉德·费尔摩的一封要求开放港口的亲笔信交给日本官方。7月，他的中队的四艘蒸汽铁甲战舰不理日本的禁令驶入了浦贺湾。可以想象，只见过木制帆船的日本人首次见到这些发出巨大声响、喷吐着烟雾的钢铁怪物时是何等的惊慌和恐惧。图为1853年7月6日佩里参观日本城堡。



与其他被侵略的国家不同，日本人将佩里作为开国的恩人来纪念，并每年在美国战舰登陆地点举行“黑船祭”。图为1953年日本政府为纪念佩里到访100周年发行的邮票。

他们的境地，他们会如何采取行动，而不是我们将如何采取行动。我不得不试图将战争中的日本人的行为作为我的一项资产——即有利条件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一种负债——即不利条件来运用。我不得不运用他们自己的行为方式来看待他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暂时的军事难题，而是作为一个文化难题来看待它。不管在战争期间还是和平时期，日本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给他们处置战争的方式提供了怎样的特殊暗示？他们的领袖激励士气的方式、安抚惶惑民心的方式、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所有这些显示出来的他们视为可资利用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我不得不认真研究这些战争中的细节，来看看日本人一步步所展现出的他们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们两个国家尚处在交战中，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这是一个严重的不利因素。它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田野调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他们家里来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并运用我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对于他们来说哪些是关键细节，哪些是细枝末节。我不能观察到他们在一项复杂事务中如何做出决定；也不能看看他们抚育培养孩子的过程。约翰·艾勃里^[2]的《须惠村》^[3]是一本有关日本乡村的田野研究，这本书非常珍贵，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许多1944年要面对的关于日本的问题都还没有出现。

尽管面对这么多的困难，作为一个文化人类社会学研究者，我确信还是有一

动议，也不仅仅是日本漫长的历史，也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的统计资料，我们必须了解的是，日本政府能指望人民做什么？我们不得不尝试去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我们不得不去了解在他们的行为和观点背后的制约力量。我们不得不将美国人采取行动的前提抛在一边，尽可能不轻率地得出一个结论：在一个给定的条件下，我们怎么做，他们也会怎么做。

我的任务是困难的。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在战争状态中很容易对对方全盘否定；但是，要试图通过敌人自己的眼睛来看他们如何看待生活，这就很困难了。问题就是，如果处在

些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公理。至少，我还可以运用文化人类学最倚重的方法：与所研究的民族面对面接触。在美国有很多日本人，他们在日本被培养起来，我可以向他们询问他们所经历的各种具体事实，观察他们怎么判断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中来填充我们的知识中的诸多空白。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我相信这些知识对于理解任何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的方式是，借助图书馆的资料来分析历史事件和统计数据，观察日本各种文字宣传和口头宣传中所运用的词汇的迁移变化。我相信他们所发现的答案是建立在规则以及日本文化价值基础之上的，但是，如果能对人们置身其中的文化进行研究，将会获得更加令人满意的答案。

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不读书，也不意味着我没有向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请教。有关日本的大量文学作品以及曾经居住在日本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们，他们给我提供了一种人类学者所不具备的优势——因为人类学者必须去亚马逊河流源头或者新几内亚高地研究那些还没有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因为没有书写文字，无法用纸张来展现自我，因此西方对他们的评述很少而且肤浅，也就没有人知道他们过去的历史。在没有前人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田野调查者必须发现这些部落的经济生活运转方式，发现他们的社会分层如何，发现他们宗教生活中的顶级

为敦促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尽快投降，美军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日本广岛市和长崎市投下原子弹。日本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



膜拜物是什么。而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我却有很多前辈学人的遗产可以继承。大量细节描写被记录在那些求知欲旺盛的学者的论文中。许多欧美的男人和女人记录了他们生活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非凡的展露自我的作品。他们并不像其他东方民族那样极其渴望冲动，在写作时将自身放在写作内容之外。日本人既写他们生活中的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他们具有令人惊奇的坦诚品质，当然他们不会和盘托出。没有一个民族会这么做。一个日本人写日本，会忽略很关键性的事物，因为他们对这些太熟悉了，就像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那样，他们已经感觉不到它。美国人在写关于美国的事物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和美国人一样，日本人也是最喜欢展露自己的。

达尔文说他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开始阅读文学作品，我也采取了这种做法，对所有我认为有意义的作品都努力去理解。为了理解议会演说中所罗列的一系列理念，我需要知道些什么？有些行为看起来是可宽恕的，但是他们却对其猛烈谴责；一些行为看起来是很凶暴的，但他们却很容易宽恕它们。这些谴责和宽容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断地问：这幅图画错在哪里？为了理解日本人的特性，我需要了解什么？

继而我转到电影，它们是在日本编剧并导演的——包括宣传片、历史片，还有反映东京以及乡村的现时代电影。我和一些日本人一起温习这些电影。这些日本人可能在日本已经看过相同影片，当然，他们看待男女主人公乃至那些恶棍，是以日本人的眼光，而不是以我的眼光来看。当我对剧情感到迷茫时，他们看起来很理解。他们对细节、动因的理解也跟我所理解的不一样，但是这些日本人是按照电影整体结构来理解的。就小说来说，我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理解之间有很大差异，这些差异远比它们所呈现出来的还要多。那些在日本成长的人中间，有些

二元化的日本民族性格

图中的日本骑士文质彬彬，但隐藏于身旁的武士刀却不经意间透露出性格中的傲慢与驕武。

这个酷爱养菊和佩刀的民族，有着迥异的二元化性格，致使西方人多年来对日本民族性格始终一头雾水。“菊”是日本皇室的徽章，代表他们性格中阳光温暖的一面，“刀”是日本武士阶层的代表，代表他们性格中阴暗残忍的一面。作者用两种差异甚大的事物形容日本人的极端性格，这也是本书名称的由来。





人非常轻易就表现出了保护日本传统的倾向，有些人则痛恨日本的一切东西。很难说我从哪一种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更多。这些人就日本人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向我提供了一些只向亲近人透露的内容，这也是他们都认可的生活，不管他们是欣然接受还是带着深刻厌恶来接受。

如果人类学者直接从他的研究对象中寻求资料和见解，那么他所有的努力无非是做了一件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观察家已经做过的事。如果这些就是一个人类学者能提供的所有东西，那就不能指望他能比那些外国居留者对日本所进行的研究再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但是，作为文化人类学者则具备足够的资本，因为他受过特殊训练，当他试图去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添砖加瓦时，这种训练看起来很管用，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被各个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所丰富。

人类学者对于很多亚太地区的文化很了解。在日本存在的很多社会风俗和日常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那些原始部落的非常相近。这些与之相近的部落或者是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新几内亚，或者是在波利尼西亚。当然，推测它们古代曾有移民和接触活动是非常有趣的话题。但是了解文化相近性的相关知识之所以让我感到重要，并不是这些可能存在历史关联所带来的问题。相比较而言，还不如说我是为了了解在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社会结构是如何运转的；而且我能够从我所看到的相近和相异性当中，来获得有关日本生活的线索。我也了解一些亚洲大陆上的暹罗^[4]、缅甸和中国的知识，因此我能够将日本与这些民族进行比较，他们都是一个伟大文化的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者在他们关于原始部落的研究中，已经反



日裔美国人

“珍珠港事件”（此后的调查发现确实有夏威夷的日裔美国人为日军提供情报）发生之后，日本对美国宣战，一夜之间，美国的所有日本裔人，不管是高级工程师还是家庭妇女，不管是老人还是刚刚出生的小孩，都成为日本间谍的嫌疑人。美国政府担心日裔美国人中有人会为日本政府服务，于是“先发制人”地把日裔美国人都圈到集中营里去。全美大约11万的日裔美国人，大多数是第二、第三代的日裔美国人，被送往在中西部特别修建的10个实际上是集中营的“relocation centers”（重新安置中心），住进了与世隔绝的生活圈中。直到战争结束美国才陆续解散了这些集中营。也正是这些人为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



复证明了这些文化比较是如何有价值。一个部落可能在正式惯例上与他的邻居百分之九十都相同，但是它可能否决了一些基础性制度安排。即使发生变更的制度就整体而言比例非常之小，但足以使未来的发展途径转向，朝着一个独一无二的方向开始发展。对于一个人类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对那些在整体上具有许多共性的民族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更有益的了。

人类学者也不得不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技术也必须专为解决特殊难题而加以磨砺。他们凭经验得知，不同的文化中的人必须面对的情境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如何判断这些情境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在一些北极乡村或者热带沙漠，他们所要面对的是部落中关于血族责任或经济交换的制度安排，外人即使有奔放的想象力，也难以想象出这种制度安排。他们不得不去调查，不仅要调查亲属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细节；而且要调查在那些部落行为中，那些制度安排的结果是什么；更要调查每一代人从年少时如何在这样的制度下调整生活状态，就像他们的先辈们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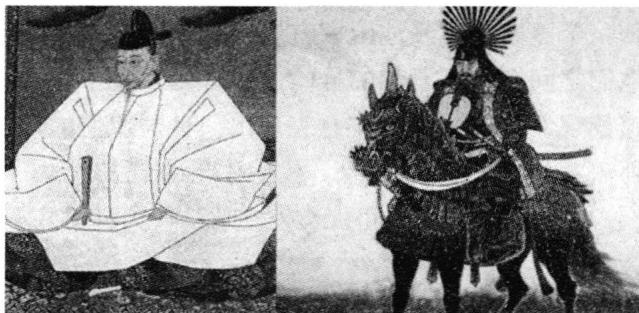
对那些差异、调整和结果的专业性研究，能够帮我们很好地研究日本。没有人能够忽略美国和日本文化之间根深蒂固的差异。我们甚至有这么一个民间笑话，日本人声称，不管美国人做什么，他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一个研究者仅仅满足于说“这些差异太过离奇，以至于不太可能去理解这样的人”，那么这样一种有关差异的定论就是很危险的。人类学者根据经验可以充分证明：再荒谬的行为也能够被理解。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可以将差异作为资产，而不是负债来运用，这方面他做的远比其他社会学者更多。正是因为所面对的都是非常奇怪的事，所以他会对比这些情境和民族极端关注。他所研究的部落的生活方式中，没有什么会被他视作理所当然，也没有什么会让他只关注那些被挑出来的事实，而不是全部事实。在对西方民族的研究中，一个在比较文化学上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会忽略整个区域的行为。他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索如下领域：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习惯、家庭事务中广被接受的定论；但正是这些内容，当它们被投射在民族大屏幕上时，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影响要远远超越外交家们所签订的条约。

人类学家不得不提升学习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那些内容在他所研究的部落中都是日常琐事，而且与他自己国家的对应物存在很大的差异。当他试图去理解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恶毒，或者另一些部落表现出的极端胆怯时，当他试图去了解在一个给定条件下，他们所如何采取行动和表达感受时，他会发现，他不得不把重点放在仔细观察和关注细节上，而这些细节经常不会被文明民族所记录。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已经掌握了很多能将其深入挖掘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很值得用于对日本的研究。因为只有当一个人注意到任何民族中的日常琐事时，他才会从最大程度上认可人类学家所提出的前提：无论是在任何原始部落，还是在文明前沿的任何民族，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学来的。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如何怪异，他的感知和思考方式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我对一些行为方式越感到迷惑，我也越发由此确信，在日本的生活中存在着决定这些奇怪行为的普遍条件。如果我的研究能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琐碎细节中，这些普遍条件一定能发现更多。人们就在那里学习。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我开始进行研究的另一个前提是：大多数孤立的行为之间也有系统上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细节如何组合成一个总体模式。一个人类社会必须为了生活而推出一些制度安排。它对某种情况下人们的处理方式表示许可，于是一些固定生活方式就此确立。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会顺理成章地将这些解决方式视为世界的基础。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也会努力整合它们。一个生活于此并接受了这一价值体系的人，如果他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维和行为，那他的生活就不得不长期处于防御状态，因为逆势而行会导致无效和混乱。他们试图创造更多的一致性。他们为自己提供了一些共同的基本原理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是必要的，不然整个体系会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制度、宗教仪式、政治目标越来越相互嵌合。一个领域可能会发生比其他领域更急剧的变化，并且给其他领域造成很大的压力，但这种压力本身可能是出于对一致性的需求。在史前时代，社会追逐的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强力，他们在经济交换中、在与其他部落交往中，十分强调获得强力的意志，在他们的宗教活动中也是如此。在那些有文献的古老文明民族中，教堂很有必要地保留



丰臣秀吉

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封建领主，1590—1598年期间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萌发了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的想法，首先要征服朝鲜，再征服中国，而后再征服印度，建立一个包括日本、中国、印度、朝鲜在内的亚洲大帝国。

在被迫开放国门之后，日本战略家们的学说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丰臣秀吉征服世界的计划，另一方面又从西方那里学到了以贸易和战争相结合，从事掠夺与征服的不二法门。而到明治时代，征服中国及世界的“大陆政策”正式出笼。由此可看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绝非偶然。

了过去数个世纪中的部分片段，而那些没有书写文字的部落则无法保留。但是，随着公众对于经济和政治权利的认可日益增长，教堂权势越来越造成了干扰，并且已经在那些领域放弃权势。话还是那么说，但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宗教信条、经济活动、政治，不再乖乖待在一个个整洁且相互独立的小池塘中，它们溢过了给它们设定的边界，水流一股股地纠结在一起。一个研究者越把自己的关注点分散在很多事实上，如经济、性、宗教和孩子培养，他就越能掌控得住他所研究的社会所发生的事，这一条通常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他也能在任何生活领域有效地提出假说和搜集资料。他能学会分辨任何民族的要求，不管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用道德的术语来表达，并将其理解为他们在自身的社会经历中所习得的习惯表达和思考方式。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针对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它探讨的是日本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观点^[5]。它描述的是这些观点如何获得自我证明，不管它是通过什么日常活动。正是这些使得日本成为日本民族。

20世纪以来，阻碍之一是我们仍然持有最含糊不清的，也是最偏激的观念，其内容不仅包括日本如何成就日本民族，而且也包括美国如何成就美利坚民族，法国如何成就法兰西民族，以及俄国如何成就俄罗斯民族。因为缺乏这些知识，每一个国家都对其他国家有误解。当冲突双方只不过半斤对八两时，我们却担心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一个国家基于其全部历史和价值体系形成了自己的道德观，当这个国家有意表现出一种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的行为时，我们却在那里妄谈什么共同目标。我们不给自己机会去了解他们的习惯和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做了，可能会发现那一行为过程并不是那么凶暴，只不过是因为它不为我们所了解。

如果全部指望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习惯来进行描述，那是不太可能的。每一个国家的作家都尽其所能来展现他们的民族，但是这并不容易。一个民族用来观察其日常生活的透镜，另一个民族并不拿来使用。人们在观察事物时，也很难意识到自己是通过透镜来观察的。任何民族都认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都是理所当然。对这些民族来说，为了能让他们观察自身的生活方式而为其提供的有关聚焦和透视方面的技巧，都像出于神灵的安排。就眼镜来说，我们不必期望一个戴眼镜的人知道透镜的计算公式，我们也不会期望这些民族能够从世界角度来分析他们自己。如果我们想知道有关眼镜的知识，我们会训练一个验光师，并且期待他能够将我们拿来的透镜计算出来度数。终有一天，我们毫无疑问必将认识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当代各民族做验光师那样的工作。

这项工作要求两样东西：足够硬的心肠和足够宽容的品德。那些心怀良好愿